

[回族历史]

## 明清北京城区及关厢地区的清真寺

丁慧倩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文章以明清时期清真寺内的历代修寺碑刻、牛街《冈志》以及晚清民国时期各回族报刊展开的社会调查资料为基础,梳理了明清以来北京城区及关厢地区清真寺的位置和数量变化,并透过清真寺的修建,了解明清两代北京回民聚居区域的空间变化和历史变迁过程。

**关键词:** 明清;北京;清真寺;历史变迁

10.16023/j.cnki.cn64-1016/c.2015.01.006

中图分类号: B9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86(2015)01-0032-08

明清时期,在王朝统治的中心北京到底有多少回民居住,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统计数字,事实上这个数字也很难统计。回民的宗教礼仪与日常生活联系密切,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每天都要到清真寺里去礼拜,因此,有回民聚集居住的地方就会建有清真寺,回回民众则围寺而居。鉴于回民有这样的居住特点,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清真寺的位置和数量来研究回民聚居区的位置、分布以及历史变迁。

对明清时期北京回民聚居区分布情况的考察主要依靠清真寺内的历代修寺碑刻、牛街《冈志》<sup>①</sup>以及晚清民国时期各回族报刊展开的社会调查资料<sup>②</sup>。

1931年,《正道》杂志在第1卷创刊号中刊登了署名“寻真”的文章,对当时北京的清真寺进行了调查。文中指出“北平的清真寺,本来是三十二座,近几年来又添设了二座,一共是三十四座。但是它们的位置,有内城,外城,四乡的分别。”<sup>[1]</sup>文中画图标注了34座清真寺的位置并开列了清真寺的名字(见图1和表1)。

民国时期北平市的行政管理范围与今天的北京市有很大的区别。1928年6月,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并设立北平特别市。由于南京政府没有明确划定它的行政区域,北平市政府“拟将本市区域东达通县张家湾,南抵丰台镇,西包西山,北收大小汤山,庶缩水陆之形胜,以永久之建设”。南京政府暂时同意了 this 范围。此后北平市与河北省商定“将东部界限悉依旧界,以免通县割裂之虞。此外就事实之必要,仍将西、南、北三面量加展拓,另定界址,以足敷建设,毋碍发展为度。东界北自东坝镇,南抵大羊坊,东北划入孙河镇,东南达马驹桥;南界包有南苑全部,抵魏善庄;西界北自石窝村北,南抵门头沟,再南凭永定河岸;北界展至大小汤山以北。计周延四百里,得大兴、宛平两县之大部分,兼昌平县之一部。”<sup>[2]</sup>北平市的行政范围于1928年10

收稿日期: 2014-1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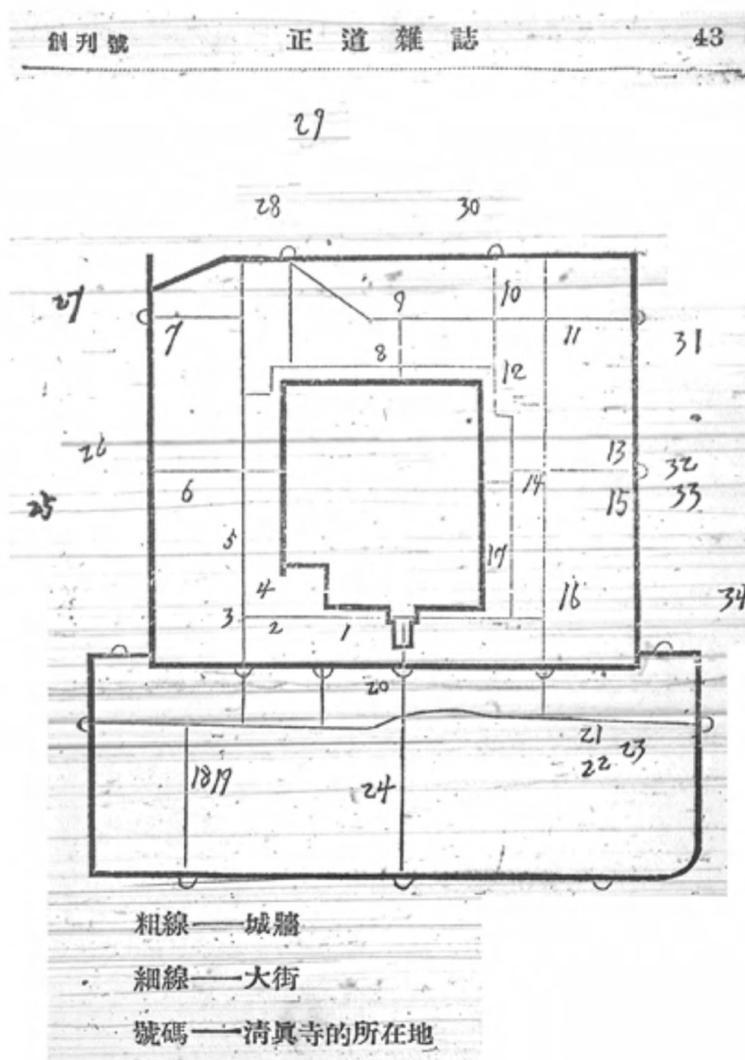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科联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2011SKL016)

作者简介: 丁慧倩(1978—),女(回族),天津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社会史、回族史研究。

月确定下来。由此可知,“寻真”的文章仅涉及当时北平城市附近的清真寺,并没有对整个北平辖区的清真寺展开调查。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可以对20世纪30年代北平城内和关厢地区的清真寺分布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根据牛街《冈志》的记载“明,宣武门之西南,地势高耸,居教人数十家,称曰‘冈儿上’,居民多屠贩之流。教之仕宦者率皆寓城内东、西牌楼,号曰‘东西两边’。居‘两边’者,视‘冈上’为乡野。嘉靖年间增筑外城,则‘冈上’为城内地。”<sup>[3][P11]</sup>这段话里所说的“两边”,指的是位于北京城内的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明代在这两个地方居住的回民以官宦居多。“冈上”即今天的牛街。在明代嘉靖朝以前,“冈上”位于城外。增筑外城之后,“冈上”被圈入城墙中。“冈上”在明代也是回民聚居之地。

牛街礼拜寺《古教西来历代建寺源流碑文总序略》记载,明代北京“节蒙皇恩敕建北京清真寺、法明寺、或为普寿,或因名礼拜寺,各匾额不同”<sup>[4][P111]</sup>。曾在1500年前后到中国的阿里·阿克巴也提到“中国皇帝在汗八里<sup>③</sup>为穆斯林建造了四座清真寺”<sup>[5][P46]</sup>。后世称清真寺、礼拜寺、法明寺、普寿寺为明代四大官寺。如唐宗正在民国时期撰写的清真寺调查报告中提到“北京全市清真寺中,有俗称官寺者四座,计名为清真,礼拜,普寿,法明等是也,其寺名清真者即东四牌楼清真寺,名礼拜寺者即牛街礼拜寺。普寿寺座落阜内锦什坊街,法明寺则位于安内二条胡同。”<sup>[6]</sup>这四座清真寺中,清真寺、法明寺和普寿寺位于北京内城,礼拜寺位于外城(见图1)。



图一 清真寺分布图

清真寺即今东四清真寺。明代《敕赐清真寺兴造碑记》记述了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即后来的武平伯陈友修建清真寺的过程。从残缺的碑文可以看到:“清真寺初名礼拜寺,在京城明照坊,……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陈[公]友所建也。”<sup>④</sup>清真寺建成之后,赐额为“清真寺”。由碑文可知,东四清真寺始建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二月十九日,落成于第二年五月五日。据王东平考证碑文撰写于景泰元年,与“圣天子嗣位”相合<sup>[7]</sup>。

明万历八年(1580年)《敕赐法明寺重修碑记》称“法明寺初名礼拜寺,在京城崇教坊。……寺成,蒙恩赐额曰法明寺。盖经始于正统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落成于明年五月五日。”<sup>[8]</sup>该碑开头部分的行文与《敕赐清真寺兴造碑记》的内容相仿,修寺时间更与东四清真寺相同,二寺可能是同时修建并获得敕额的。

普寿寺的始建年代已不可考。据成书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的《宛署杂记》记载“普寿寺,古刹;普照寺;鹫峰寺,正德四年建。以上俱在金城坊。”<sup>[9]</sup>民国时期,唐宗正在《锦什坊<sup>⑤</sup>街清真寺》的调查文章中提到该寺仅存的一些石刻残件上有“崇祯岁次乙亥春

月谷旦重修”“大明天启某年重修”<sup>[6]</sup>等字样,可见该寺在明代曾多次修缮。

表1 内城、外城及四乡清真寺列表

位置	数量	名称	位置	数量	名称
内城	十七座	1. 宣武门内安福胡同回回营	外城	七座	18. 宣武门外牛街
		2. 宣武门内牛肉湾			19. 宣武门外教子胡同
		3. 宣武门内手帕胡同			20. 正阳门外笤帚胡同
		4. 宣武门内西单牌楼北路西			21. 崇文门外花市大街
		5. 阜成门内粉子胡同			22. 崇文门外上唐刀胡同
		6. 阜成门内锦什房街			23. 崇文门外上堂子胡同
		7. 西直门内沟沿			24. 永定门内天桥
		8. 地安门外什刹海	四乡	十座	25. 阜成门外三里河村
		9. 地安门外鼓楼			26. 阜成门外关乡
		10. 安定门内二条			27. 西直门外关乡
		11. 东直门内南小街			28. 德胜门外关乡
		12. 东四牌楼北中剪子巷			29. 德胜门外马甸村
		13. 朝阳门内豆芽菜胡同			30. 安定门外关乡
		14. 东四牌楼			31. 东直门外二里村
		15. 朝阳门内禄米仓			32. 朝阳门外上坡
		16. 崇文门内苏州胡同			33. 朝阳门外下坡
		17. 崇文门内丁字街			34. 朝阳门外八里庄

资料来源《正道》第1卷创刊号,1931年,第42-45页。

学界对位于“冈上”的礼拜寺的初建年代有许多争论。前揭《古教西来历代建寺碑文总序略》重立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81年)的。虽名“碑文”,实则书写于木匾之上,俗称“白匾”。其正文之后,另有注释小字:

旧有碑文系明崇祯三年掌教王永寿、协教八继德、赞礼白如瑾,同乡老黄宗武重修。近因日久年深,风雨侵蚀,字残碑损,恐其失传,特为增补重修,以志不朽云。<sup>[4](P111)</sup>

从注文可以看到,旧有碑文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重修,至清康熙时又有所增补,形成现在的内容。

“白匾”的正文追述了礼拜寺创建的过程:

及宋真宗至道二年,有筛海革哇默定者,西域辅喇台人氏,入觐中国。常感异梦而生三子。长曰筛海赛德鲁定,能知死者墓中之善恶,去而莫知所之;次曰筛海那速鲁定,知人不言之心事;又次曰筛海萨阿都定,能通百鸟之语音。之二君者,性近幽处,不干仕进,上赐官爵,坚辞弗受,是以授为清真寺掌教,留居东土。而二君具其先见之明,知燕京为兴隆之地,可以开万世帝王之鸿业,遂请颁敕建寺,世为清真寺掌教。都定君奉敕建寺于东郭,鲁定君奉敕建寺于南郊,而皆受赐基以茔墓于西阜焉。原夫鲁定君之寺,即吾牛街寺也。<sup>[4](P111)</sup>

由于“白匾”在康熙年间针对崇祯重修的碑文有所增补,我们不清楚增补的具体内容。因此只能说,“白匾”的记述体现了清前期人们对牛街礼拜寺建寺历史的文本表述。源于“白匾”的记载,后来的著述者未加考订便提出牛街礼拜寺建于“宋真宗至道二年”<sup>⑥</sup>。但此一观点谬误很多。首先,细读“白匾”原文,“宋真宗至道二年”指的是革哇默定入觐中国的时间,文中并没有说明那速鲁定建寺的时间。其次,“至道”并不是宋真宗的年号,而是其父宋太宗的最后一个年号。宋太宗于至道三年(997年)农历三月去世,真宗登基后于第二年改元咸平。第三,北宋时北京地区在辽朝的控制之下。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宋辽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南北对峙。如果牛街礼拜寺在元明时期甚至更早保存有建寺时留下的文字资料的话,其对建寺时间的记载也应使用辽朝的年号。正是基于这一点,有研究者修正了“宋至道”说,提出礼拜寺创建于辽统和年间。两说仅是年号不同,皆源于“白匾”的记载。

牛街礼拜寺内保存的明代碑刻讲述了另外一个建寺的故事。

……京之都城西南隅去五里许,始为草创,构□小室数□,忝有□额,爰及厥初。宣德二年,金吾指挥同知李……

……奏请寺额,蒙宪宗皇帝敕赐曰礼拜寺<sup>⑦</sup>。

这块撰写于明弘治九年(1496年)的《敕赐礼拜寺记》,部分碑文漫漶不清,较难辨识。从上面引用的碑文片刻看,宣德二年(1427年)金吾卫指挥同知李姓者似与清真寺的修建有所关联。而该寺获得敕名的时间为宪宗成化年间。

另一块撰写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的碑文《敕赐礼拜寺记》较为清晰地记录了礼拜寺的修建过程:

宣德二禩,瓜瓞奠址,正统七载,殿宇恢张,唯成化十年春,都指挥詹昇题请名号,奉圣旨曰:礼拜寺<sup>[10]</sup>。

可见牛街礼拜寺应创修于宣德二年,至成化十年(1474年)请得敕额。成书于康熙末年或雍正初年的《冈志》也记载牛街礼拜寺“明世奉敕建”<sup>[3][P6]</sup>。

“冈上”地区的另一座清真寺可能也建于明朝。据《冈志》记载,明崇祯年间冈上地区教众因礼拜礼仪的分歧,有杨、李二姓捐资在东街路西创建新礼拜寺,俗称小寺、东寺,即后来的教子胡同清真寺。清康熙初年,该寺复建。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敕赐额为永寿寺。<sup>[3][P6-7]</sup>

在明代外城,还有花儿市清真寺。该寺遗留的建寺条石刻文称其于“大明永乐十二年岁次甲午春正月吉旦修建,崇祯元年岁次戊辰秋仲月吉旦重修……”<sup>[11]</sup>可见该寺在明代也经多次修缮。

## 二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攻克明朝都城,清廷从沈阳迁都北京。由于清廷确立了“首崇满洲”的原则,实行“旗民分治”,在畿辅地区推行旗民分居政策。顺治三年(1646年),清廷以北京城内“盗贼窃发”为借口,要求原居内城的民人尽快迁往外城,腾出的内城则由八旗占住。从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起,清廷加大了旗民分城居住制度推行的力度,内城由八旗依方位而居,原来住在内城的官民一律迁居于外城,北京城由此划分为“满城”和“汉城”<sup>[12]</sup>。

清初“旗民分治”政策的实施,对居住在内城的居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回民也不例外。据牛街《冈志》的记载:“明亡,大清兵入阙,驱民出城。居‘两边’者失其所有,遂尽趋‘冈儿上’。”<sup>[3][P1]</sup>经过这一次大的搬迁之后,有明一代回民在北京城形成的居住格局发生了变化,在北京的外城、城关和近郊等地出现了大量新的回民聚居区。

1937年,王梦扬在《北平市回教概况》一文中对当时北平市区及远郊清真寺做了调查,绘制成“北平市郊清真寺调查表”<sup>[13]</sup>,表中使用金吉堂的调查对各清真寺的修建年代进行了标注。该表共收录清真寺46处,其中女寺5处,均建于民国年间。城郊清真寺8处,包括南苑西红门、朝阳门外八里庄、西郊海淀、西郊四王府、西郊蓝靛厂、西郊安河桥、西郊树村和北郊清河的清真寺。城区及关厢清真寺共33处。现将“北平市郊清真寺调查表”中外城和城关清真寺的信息改绘如表2。

教子胡同清真寺的修建历史前文已有论述,金吉堂将其兴建年代定为清康熙初年,应是指该寺在明清之际荒废之后于清初重修,而其始建年代应在晚明。

前门外笞帚胡同清真寺相传始建于明代中叶,此说见于民国29年(1940年)《京师笞帚胡同清真寺捐助寺产碑记》<sup>[4][P48]</sup>。该寺门额书有“清真礼拜寺”,款识为“康熙庚申年重修”,又有“乾隆乙卯年孟夏重修”<sup>[14]</sup>。光绪《顺天府志》记载“羊肉胡同,西有回人礼拜寺。”<sup>[15]</sup>即指该寺。说明该寺始建年代最晚不晚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

崇文门外的堂子胡同清真寺和上唐刀胡同清真寺,均位于花市清真寺南,规模比较小。

寻真文中提到外城还有一座永定门内天桥清真寺。在金吉堂的调查中,标注天桥清真寺始建于民国十五年。另据1939年《回教月刊》对北京清真寺的调查报告记载:“北京全市清真寺计共约四十座,其历史深远者固占多数,而入民国后方始兴建者亦属不少,如西单、天桥、鼓楼湾等,此外如牛街、西三里河、唐刀胡同等处之各女寺等是也。”<sup>[16]</sup>可见天桥清真寺建于民国年间。由此,清代北京外城共坐落6座清真寺,即牛街礼拜寺、教子胡同清真寺、外笞帚胡同清真寺、花市清真寺、堂子胡同清真寺和上唐刀胡同清真寺。

与前文所引寻真的调查相对比,朝阳门外南中街清真寺不见于寻真的文章,但寻真文章中第32座清真寺为朝阳门外上坡清真寺。查朝阳门外上坡清真寺即南上坡清真寺,原坐落于南中街内,现已被拆除。所以南中街清真寺即为上坡清真寺。

表2 清代北京外城和城关清真寺表

	寺名	位置		建筑时间
外城	清真寺	宣武门外	牛街	据《冈志》所载建于北宋,今存大殿奠基实宣德二年
			教子胡同	清康熙初
		前门外	笤帚胡同	明代
		崇文门外	花市	明初
			堂子胡同	清道光初
			上唐刀胡同	清光绪八年
城关	清真寺	朝阳门外	南中街	清康熙初
			下坡	清康熙初
		东直门外	二里庄	元代
		永定门外	大关	清嘉庆
		德胜门外	大关	清康熙
			马甸	清康熙
		西直门外	南关	清乾隆
		阜成门外	大关	清乾隆五十八年

东直门外二里庄清真寺相传创建于元代。现存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重修古迹清真寺碑记》并未说明该寺的始建年代<sup>[17]</sup>。该寺至迟应建于清朝初年。

永定门外大关清真寺不见于寻真的调查,寻真提到的安定门外关乡的清真寺没有收入“北平市郊清真寺调查表”中。《北京的宗教》一书认为,安定门外大关清真寺建于康熙年间,但没有指明这一兴建年代的史料出处<sup>[18]</sup>。

如表2所示,清代北京内城城关地区的回民聚居区在清代形成规模,清真寺的修建时间集中在康熙和乾隆两朝。如德胜门外马甸清真寺道光三十年(1850年)《重修京都德胜门外马店礼拜寺碑记》记载,该寺“创自康熙年间”<sup>⑧</sup>。永定门外清真寺修建于嘉庆年间,时间较其他清真寺晚。但永定门为外城南部中间的城门,与内城南部中间的正阳门(即前门)相对,其关厢地区清真寺的修建受“旗民分治”政策的影响较小,因而与内城关厢地区清真寺的发展过程略有区别。

城市的关厢地区,因为人们沿着城门外的道路进出城市,久而久之,便在道路两旁、城门附近形成密集的居住区。北京城在清初实行“旗民分治”之后,民人迁出内城。但是庞大的八旗人口需要物资的供给和交换,一些商贩便在关厢地区开设店铺,而流动商贩、佣人差役、闲荡之人也选择在关厢居住或店房下榻。关厢地区还为进出北京城的人们提供车马骆驼和脚力。仍以德胜门外马甸为例,“出德胜门三里许,为马甸。回民荟萃处也。教民多马姓,故名。不知者,皆以为‘马店’之误云:北平回民虽夥,恒散居杂处。繁衍递传,世世相聚者;除牛街外,即属马甸。”马甸是北京城羊只消费的供应地。“马甸教民,多操羊业。间亦有业马行者。以马甸一村之羊只,能供全北平市之需用。”<sup>[19]</sup>据民国年间调查显示,马甸羊业的规模“逊清之季,每年入城羊只逾十三万头。民国以来,一般经济情形低落,每年入口,不过三万余只。近年以来,羊业渐盛,每年,又增至五六万只以上矣。”<sup>[20]</sup>光绪年间马甸清真寺重修的工程便是由13家羊店、1家马店捐助的<sup>⑨</sup>。

### 三

在我们关注“旗民分治”对北京回民分布格局的影响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内城仍有回民居住,原有的清真寺也没有因为“旗民分治”而完全衰落。如《冈志》中《舍公谈性理》一节记载,康熙年间舍蕴善来到北京游学,他离开牛街后移居东城,“东城豪富金、张诸姓,扫榻以候之”<sup>[3][P49]</sup>。光绪六年(1880年)《重修法明礼拜寺碑记》记载“前于万历八年仲秋重修,后至于国朝嘉庆,历年二百有余,经绅士马芝玉引众重修,至今百有春秋。”<sup>[21]</sup>可见内城至迟在康熙年间已有回民居住,清真寺在清中后期的活动也有迹可循。不仅如此,到了

嘉庆年间以后,内城又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清真寺,说明回民在内城形成了多个聚居地。依据“北平市郊清真寺调查表”改绘如下(见表3):

表3 清代北京内城新建的清真寺

寺名	位置		建筑年代
清真寺	崇文门内	苏州胡同	约在清嘉庆
	朝阳门内	禄米仓	清初
		豆芽菜胡同清真寺	清嘉庆
	王府井大街		清光绪
	中剪子巷		清同治
	东直门内	南小街	道光
	什刹海		清朝
	西直门内	沟沿	清道光
	西四牌楼粉子胡同		清道光
	西单牌楼		清光绪
	宣武门内	手帕胡同	清光绪
	宣武门内	牛肉湾	清光绪
普宁寺 <sup>⑩</sup>	和平门内	回回营	清乾隆二十九年

回回营清真寺的创建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平定维吾尔大小和卓叛乱后,迁居维吾尔人入京有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正月,乾隆皇帝喻示:

在京安插回人内,颜色伊系公品级,玛木特、图尔都和卓系扎萨克,应归理藩院管辖。又乐工匠艺人等,共编一佐领,其佐领著白和卓补授,归内务府管辖,嗣后续到回人,均入此佐领下<sup>[22]</sup>。

颜色伊、玛木特、图尔都和卓都是在清廷平定大小和卓叛乱过程中,与清廷合作的维吾尔上层人士,他们被迁入京师居住。而其他迁来的“乐工匠艺人等”及后续内迁回人则编为一佐领,便于管理。清廷于“于西长安街路南设回营一所居之,共房百四十有七楹。回营内设办事处房,以内府官董其事”<sup>[23]</sup>并于回营之西,修建礼拜寺,以示清廷的恩遇。乾隆皇帝亲自撰写了《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碑文中提到:

朕寅承天地宗社<sup>⑪</sup>鸿庥,平准噶尔,遂定回部各城。其伯克霍集斯、霍什克等并赐爵王公,赐居邸舍。而余众之不令回其故地者,咸居之长安门之西,俾服官执役,受旅处,都人因号称回子营。夫齿繁则见庞,类辨则情涣,思所以统同合异,使瞻听无奇袤,初不在辟其教而揉矫之也。且准部四卫拉特内附,若普宁寺,若固尔札庙,既为次第敕构<sup>⑫</sup>,用是宠绥,回人亦吾人也,若之何望有缺耶!爰命将作支内帑羨金,就所居适中之地,为建斯寺。<sup>⑬</sup>

回回营清真寺建成后,成为驻京维吾尔人的礼拜场所。“回众以时会聚其下,轮年入觐之众伯克等无不欢欣瞻拜。”<sup>⑭</sup>说明回疆伯克等年班人员也在此礼拜。1938年,唐宗正对回回营清真寺的调查显示该地的居民多系旗籍,以黄、马、金、邓四姓为大户。该寺于民国初年被袁世凯拆毁<sup>[24]</sup>。

纵观明清以来北京城清真寺的空间变化过程,明嘉靖年间北京外城的修筑和清初“旗民分治”政策的施行是两个重要的事件,它们直接导致了回回民众聚居规模、位置的变化。明代北京内、外城回民之间存在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尤其是内城东西两边的居民以“教之仕宦”为主,而冈上地区则为“屠贩之流”。外城的修筑使原居于城外的聚居区变成了城内地,这使清初“旗民分治”后城内的前朝“仕宦”回民趋向于迁入外城的冈上地区。内城居民向外城的迁移,成为造就牛街在清代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清初“旗民分治”政策的施行,对清代北京内、外城回民聚居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内城清真寺的修建年代集中于嘉道以后,晚于内城城关清真寺的修建时间。这说明“旗民分治”的政策在清初实施,确实导致回民人口向城外移动,并在城关地区聚集。康熙年间,民人开始少量流入内城,到嘉庆以后,内城中的民人住户逐渐增多,“旗民分治”政策瓦解<sup>⑮</sup>。内城新建清真寺集中于此时出现,也可印证这一现象。民国以来,北京内外城及关厢地区回民聚居区的分布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

注释:

- ①牛街《冈志》是一部记录北京外城西北角以牛街为中心的冈儿上地区回族聚居区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的志书,成书时间大约是康熙末年或雍正初年。该志书及相关文献由北京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名为《北京牛街志书——〈冈志〉》。对《冈志》的研究,参见姜纬堂《〈冈志〉初探》,载《北京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刘东声、刘盛林《关于〈冈志〉》,载《回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大业《清代北京牛街志书〈冈志〉研究》,载《清史论丛》,辽宁古籍出版社,1993年。
- ②晚清民国时期各回族报刊展开的社会调查资料,参见《北平清真寺的调查》,载《正道》第1卷创刊号《北平德胜门外马甸清真寺的调查》,载《正道》第1卷2号《北平德胜门外大关法源清真寺调查》,载《正道》第2卷1-4期(第1号);《北平市回教概况》,载《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5期《牛街礼拜寺说略》,载《月华》第9卷第2、3期《北平全市的清真寺》,载《震宗报月刊》1936年第3卷第1、2期《海甸回教状况》,载《晨熹》1936年第2卷第7号《北平市礼拜寺调查记》,载《月华》1937年第9卷第4-5期《北平市清真寺调查记》,载《回教》1938年第1卷第6、7期等。
- ③汗八里是元代蒙古人对元大都的称呼,意为“汗城”。
- ④王东平《北京东四清真寺“敕赐清真寺碑”考》,载《回族研究》2010年第1期。碑文另见金吉堂《敕赐清真寺的五百年》,载《月华》1947年6月号,收入李兴华、冯同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 ⑤据成书于清光绪年间的《京师坊巷志稿》“锦什坊街”条目记载“普寿寺有敕建额,回人礼拜寺也。案元于平则门内置金城坊,明因之。今锦什坊街,南街闹市口,北抵平则门,疑即金城坊街之讹。”由此可知《宛署杂记》所记金城坊普寿寺即清代以来的锦什坊街清真寺。参见[明]张爵、[清]朱一新《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京师坊巷志稿》,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4页。
- ⑥参见尹伯清《牛街礼拜寺说略》,载《北晨画刊》1936年第7卷第11期,后又刊于《月华》1937年第9卷第2、3期合刊。
- ⑦《敕赐礼拜寺碑记》拓片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编号4564);另见《清真古韵:北京牛街礼拜寺》,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95页。碑文见姜立勋、富丽、罗志发《北京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12-213页;回宗正《北京清真寺碑文辑录述要》(印刷本),第35-38页。王东平对该碑部分内容进行了辨识,参见《明碑所载官员助修北京清真寺考》,载《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
- ⑧《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1册,第192页。碑文另见《北平德胜门外马甸清真寺的调查》,载《正道》1931年第1卷第2号。
- 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1册,第193页。碑阴题名中有源顺马店和另十三家店铺的名称,这十三家店铺并未标明是羊店。据1930年薛文波的调查“以道光年计算,羊店计有十三处(荣茂、久丽等店),马店(源顺马店)一处”,可知碑文上的十三家店铺应为羊店。参见薛文波《马甸之回民现状》,载《月华》1930年第2卷第15期。
- ⑩称回回营清真寺为普宁寺,是对《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的误读。碑文中提到的普宁寺,系指清乾隆年间在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后,清廷在承德为其修建的藏传佛教寺庙。
- ⑪《日下旧闻考》中收录为“祖宗”,碑文拓片为“宗社”。参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2册,第59-60页。
- ⑫《日下旧闻考》中收录为“创构”,碑文拓片为“敕构”。
- ⑬详见[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第71卷《官署》,第1194页。个别字句根据碑文拓片略作调整。
- ⑭对《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的研究,参见王东平《乾隆御制〈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的两个问题》,载《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纪大椿《乾隆时期寓京维吾尔人和敕建清真寺》,载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95-302页。
- ⑮参见刘小萌《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参考文献:

- [1]寻真.北平清真寺的调查[J].正道,1931,1(创刊号):42.
- [2]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511-512.
- [3]刘东声,刘盛林.北京牛街志书——《冈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 [4]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4册)[Z].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 [5]阿里·阿克巴尔.中国纪行[M].张玉善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 [6]唐宗正.北京市清真寺调查(之七)锦什坊街清真寺[J].回教,1939,2(3):41-43.
- [7]王东平.北京东四清真寺“敕赐清真寺碑”考[J].回族研究,2010(1):160.

- [8]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7册)[Z].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 89.
- [9] [明] 沈榜. 宛署杂记[Z].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0: 224.
- [10]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9册)[Z].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 59.
- [11]唐宗正. 北京市清真寺调查(之五)[A]. 李兴华, 冯今源. 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上册)[C].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457.
- [12]刘小萌. 清代北京旗人社会[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 [13]王梦扬. 北平市回教概况[J]. 月华, 1937, 9(12).
- [14]回宗正. 前门外清真古寺[A]. 胡玉远. 日下回眸老北京的史地民俗[C].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1: 214.
- [15] [光绪] 顺天府志[Z].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416.
- [16]唐宗正. 北京市清真寺调查(之六) 鼓楼清真寺[J]. 回教, 1939, (2): 33.
- [17]回宗正. 北京清真寺碑文辑录述要[Z]. 内部印刷: 121-123.
- [18]姜立勋, 富丽, 罗志发. 北京的宗教[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231.
- [19]薛文波. 马甸之回民现状[J]. 月华, 1930, 2(15).
- [20]王梦扬. 北平市回教概况[J]. 月华, 1937, 9(12).
- [21]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5册)[Z].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 23.
- [22]清实录·高宗实录(八): 卷605·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壬戌[Z].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23] [清] 于敏中, 等. 日下旧闻考: 卷71·官署[Z].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5: 1193.
- [24]唐宗正. 北京市清真寺调查(之二) 回回营清真寺[J]. 回教, 1938, 1(7): 53-63.

## Muslim Mosques Inside Beijing City and the Outskirt Areas of the Cit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ING Hui-qian

(History and Culture Institute, Central Minzu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tablet inscriptions inside the mosqu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iu-jie “Gang Zhi”, and various social survey data published in the Hui periodicals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 The writer reviewed the position and number of changes of the mosques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se mosques were located inside Beijing city and the outskirt areas of the city. Through these mosques, the writer wanted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spatial variation and historical change in the inhabited areas of Hui people.

**Key word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eijing; Masjid; Historical Changes

责任编辑: 钟银梅